

“ 络 氏 ” 考

周 向 永

(铁岭市文管办)

两汉之际，中原多故，高句丽乘势扩张。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高句丽大武神王无恤“出师伐夫余，……杀其王，未灭其国”(《三国史记》卷十四)，是役致夫余国脉衰竭：夫余王带素从弟与万余人降顺高句丽，“王封为王，安置楸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三国史记》卷十四)，几近国破家亡。值得玩味的是，这万余络氏之属因得赐姓的“络文”是什么样子？络氏在以后的高句丽史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已掌握的田野考古材料中，哪一部分应该是这些络氏之属的遗存？本文拟以此发微，略作考述，随见之处，尚望指正。

(一)

得姓络氏的因由是“背有络文”，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纹身之意，当无大谬。然而谁“背有络文”？夫余王从弟自己，抑或是他带来的这万余降众？“王封为王，安置

“ 络 氏 ” 考

周 向 永

(铁岭市文管办)

两汉之际，中原多故，高句丽乘势扩张。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高句丽大武神王无恤“出师伐夫余，……杀其王，未灭其国”(《三国史记》卷十四)，是役致夫余国脉衰竭：夫余王带素从弟与万余人降顺高句丽，“王封为王，安置楸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三国史记》卷十四)，几近国破家亡。值得玩味的是，这万余络氏之属因得赐姓的“络文”是什么样子？络氏在以后的高句丽史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已掌握的田野考古材料中，哪一部分应该是这些络氏之属的遗存？本文拟以此发微，略作考述，随见之处，尚望指正。

(一)

得姓络氏的因由是“背有络文”，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纹身之意，当无大谬。然而谁“背有络文”？夫余王从弟自己，抑或是他带来的这万余降众？“王封为王，安置

椽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从上下文推断，这“背有络文”的人好象只是夫余王从弟一人。然而与理不达的是，纹身者如系单指，那么纹身之习难道只是夫余皇室专有？如此，有关夫余的史籍当无漏载之理，然却不见记之于史。我个人认为，“以其背有络文”之“其”，指代的应是前文所谓被“安置椽那部”的降众，作为源于秽貊的夫余，虽然有关纹身之俗史载阙如，但国中有部分部族如地处夫余边地的秽貊土著一直保持纹身的习惯，想来并非难以理喻。“九夷十蛮越沕箭发文身”（《佩文韵府》卷26下·十一），古时的秽貊土著，在几个大国的边地（如夫余、高句丽、沃沮等国周边），因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仍旧保留着自己独有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习俗亦实在情理之中。如果此说无误，那么这部分“背有络文”的土著人的聚居之地，就在夫余与高句丽的接界地区，即与吉林哈达岭几乎平行的辉发河流域。广而言之，这一区域的外延部分也应包括今辽东北部山地，勾稽史籍，两汉之际，这里也确实活动着一大批呼啸山林的秽貊人。

秽貊分布广大，见诸历史悠久，他们一直是各有分野，不相统属。“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后汉书·东夷列传》)，说明时至后汉，他们仍处于氏族部落的形态。三国时的夫余，其辖境内也有若干“邑落”，这些“邑落有豪民，各下户皆为奴仆”(《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不能排除这邑落下户奴仆之中有部分秽貊土著的可能性。《汉书·王莽传》：“秽貊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这里的“夫余之属”，显然指的是夫余人之外且又臣属夫余的一些弱小部族，在当时的民族分布中，除了土著秽貊，别无它指。西汉时“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貊”(桓宽《盐铁论》地广第十六)，明言临屯、朝鲜一带都是秽貊人。此外，这些秽貊人或秽貊土著，严格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未被同化到周边的某一大国中去，后汉时，对这部分人的国属在正史中仍未能确指。《后汉书·东夷列传》：“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复与秽貊寇玄菟”，此处的秽貊是高句丽的联军，又同书：“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秋，宫遂率马韩、秽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这里的秽貊既不属高句丽，也非属夫余，而是他们的盟军。在东北古代史上，殷国以降的诸多国家多从秽貊发展而来，可谓出于

秽貊而又别于秽貊。张博泉先生说：秽貊中先进的部分分化出来而各有称谓，“秽貊则成为历史上后进的族称被保留下来了”（张博泉《肃慎燕亳考》，《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是切近事实的；我这里斗胆补充：被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族称，也有部分秽貊土著人。络氏之属在与夫余王从弟投奔高句丽之前，即属此类。

（二）

我们再讨论“络文”。

《说文》：“络，絮也，一曰麻未沤也”。《急就篇·颜师古注》：“络即今生丝也”。概而括之，意为粗阔的条状纹饰，其特点是若断若续，类似“麻未沤”或“生丝”的形状。把这种纹饰装饰在脊背上，说明纹饰的创作者对这种纹饰的崇拜与钟爱。这样一种神圣的纹饰，会不会被这些土著人装饰于生产或生活的其他环境，例如用具或器皿之上呢？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页）。换一个角度说，陶器纹饰也不单纯是装饰艺术，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它

在绝大多数场合是作为民族图腾或其他崇拜标志而存在的（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6期）。因此，这部分络氏之属的土著秽貊，将这种络纹不仅施于身体，也施于例如生活器皿之上的情形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历史上与高句丽毗邻的地理和相似的环境等原因，本文将考释的着眼点放在辽北东部山地。春秋战国以至两汉之际的辽北东部山地，青铜文化明显地表现出早晚两类遗存特点。比较商周之际的夹细砂素面陶文化，夹粗砂而又带有简单纹饰的一类遗存，无疑是一种晚期的青铜文化遗存，前者含三足器，而后者则绝无仅见，可以作为判断早晚的又一佐证和标尺。尽管在辽北东部山地这类遗存遗址有数百处之多，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一处经过科学发掘，所有的材料几乎均系采集。因在西丰县凉泉镇的部分遗址中，这类遗存富有代表性，所以在有关著述中，这类遗存或被称为“凉泉类型”（辛岩：《辽北青铜文化综述》，引自辽宁省第二届考古学会论文材料）。为叙述方便，这里暂且从之。

凉泉类型是一种夹粗砂陶系的文化遗存，在辽北地区

分布广泛，而主要集中于东部山区。其特点是：陶器皆作夹粗砂陶，陶土中作为羼和料的石英颗粒粗大，烧制火候一般不是很高，陶色驳杂，而以暗褐色的灰陶占其大宗；制陶风格草率粗糙，手制痕迹非常明显；器表多施纹饰，表现亦不尽相同：在面积较大的器表，如豆柱、罐身上，施以规则的、若断若续的戳印纹，形似麦粒；在器物附件如釜耳正面，则施疏密有致的条状沟纹，不施纹者几乎不见。网坠、纺轮等小型生产生活用具，器表亦见施条纹者，形制多样，且数量丰富。石器中较具特点的是石斧，形体一般比较硕大，圆柱状的斧身似为精细琢制，舌状的斧刃却经磨制而成；砍砸之用的锤斧数量亦丰，形制略似石斧，区别只在圆形的砍砸面代替了斧刃。据资料介绍，类似的文化遗存还分布于吉林的柳河、海龙、磐石一带（李殿福《两汉时代的高句丽及其物质文化》，《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1期）。在属辽源市的吉林东丰大架子山遗址，所采标本与凉泉类型别无二致（东丰县文化馆等：《吉林东丰县原始遗址调查》，《考古》1988年7期），这种文化面貌相同或相近的现象，应当被认为是相同或相近的民族集团及其地理环境和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制约的经济

技术水平使然。那些有规律排列的戳印点纹、那些一道道疏密有致的条状沟纹，与“麻未沤”和“生丝”的形状何其相似，以至我们甚至难以用较之更确切的名物来名状这些纹饰，而这也正是实物标本和古文献资料交相给予我们的提示。

辽北东部山地凉泉类型的年代，据与其面貌相近的吉林杨屯遗址—西团山晚期层位碳十四测定数据，为公元前 205 ± 90 年（经树轮校正），其对应年代正是战国秦汉之际，在其上层的叠压堆积中，出有与汉陶共生的陶片标本，被认为是已进入汉代的遗存（刘振华《试论吉林西团山文化晚期遗存》。《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凉泉类型的年代上限不过春秋战国，下限可达两汉之际。无独有偶，在凉泉类型的遗址中，我们也发现了绳纹陶片和铁器标本，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两千多年以前，辽北东部山地居住着一大批土著秽貊人，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直至发展到汉文化大面积覆盖了这块边鄙之地的西汉时期。

(三)

“安置椽那部”，是高句丽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此条史载涉及两种可能：1、高句丽原有椽那部，无恤将万余降众安置其中。但这需以万余降众与原椽那部在语言交流、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绝少障碍为必要前提，而这种假定又难以回答原椽那部源于何处的问题。本文不取此种可能；2、大武神王以这万余降众为主体，新设椽那部。因为降顺的这部分土著人原本居于集安北部的辉发河流域，就地安置这部分人不离家园，非但减少了这些人的迁徙之苦，同时也减少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与之配套的方略还有“王封为王”，一袭官衣，也少许平衡了带素从弟落魄王室的失落感。依其特点，给予名号，将其首要，拜为将相，这本是历代统治者绥抚边地的一项恒策，即便是在高句丽史上，这个举措也并非是开天辟地。朱蒙立国不久曾与松让争雄，最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卷十三），大武神王只是如法泡制而已。本文倾向于第二种可能。

椽那部以络氏为主而设，故高句丽史籍中有时也称椽那为“椽氏”。如高句丽中川王时“立椽氏为王后”即此

(《三国史记》卷十七)。“络”“椽”古音通转;“络”隶铎部来母,“椽”隶元部定母,定来均属舌头音,铎元两部可以通转(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1版。以下古音考证均引此书,不注)。《好大王碑》云,高句丽所征城邑,往往名之“××奴城”,被征者亦“永为奴客”,或谓“以奴客为民”。因此,“那”即“奴”,两字皆系泥母,一音之转,椽那就是椽奴。而椽奴又是绝奴:“椽”为元部定母,“绝”隶月部从母,定从为准双声,月元两部可对转,故“椽那”与“绝奴”实为一事,都是因为时间推移和抄转不一而对络氏在音声方面的不同称谓而已。

李德山先生对高句丽五部称谓亦曾做古音韵考证,认为绝奴之“绝”为介母,是“介”的一音之转,而“奴”则由“莱”转,进而考定绝奴部族源系自山东半岛迁徙而来的古介族与古莱族混合而成(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前已叙及,“绝”隶从母,非介母字,以绝奴部为介族之后,尚待再考。“绝奴部世与王婚”(《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其缘由大抵因桂娄部皇族始祖朱蒙出自夫余,因

而也世代与同出夫余的绝奴部联姻，这从另一方面佐证了绝奴部作为高句丽后族在族源上与其他几部的异同之处。

综上，本文认为“络氏”之属应为世居辉发河流域的一支有纹身习俗的土著秽貊，并入高句丽后，大武神王以之置楸那部，古音韵的诠释和物质文化的特点都辅证了楸那部亦即绝奴部的结论。络氏、楸那、绝奴一以贯之，最终在高句丽五部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民族一起，为共同开发祖国的东北边疆做出了贡献。

一九九三年十月